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6.018

青年马克思对待德国“内在性”文化传统的态度及其现实启示

杨增崇,党佳美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如何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德国的“内在性”文化传统构成青年马克思解答这个问题的思想前提。思辨哲学是民族主义存在和传播的“文化渠道”。重视思维内省的“内在性”传统使得德意志民族以文化民族主义回应民族国家“缺位”的认同危机,然而这一传统在形塑民族文化自觉和思想深度的同时,使得知识分子将政治问题置换成思想文化议题,沉浸在思想领域而疏离现实世界。青年马克思对德国“内在性”文化传统进行扬弃与超越,他批判思辨哲学以理论抽象代替变革现实的行动,同时揭露民族主义的狭隘世界观。马克思在对待德国“内在性”文化传统时所展现的科学态度,对新时代推进“两个结合”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德国文化传统;“内在性”;“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6-0157-09

“如何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是每个民族在现代浪潮中必须主动反思和回答的课题,青年马克思在自己新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关注了这一重要的“问题域”。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的文化理论、马克思的文化观等相关议题的讨论较为充分,但对于马克思作为一个德国人,他到底是如何对待德国的文化传统却鲜少有研究,这是一个需要被“解蔽”和探讨的理论问题。

追溯德国的文化传统,一种强调对精神维度的探寻和主体内在世界构建的文化特性赫然在目,所谓“内在性”便是这种传统的概括性总结。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德意志民族在民族国家“缺位”的前提下先于文化领域构建民族认同,走上了文化民族主义的道路,思辨哲学为这种民族主义的存在发展提供了文化渠道。青年马克思正是在对德国“内在性”传统及其表现形式的扬弃与超越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新哲学,因此可以认为,对德国“内在性”传统的批判构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①。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所展现的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对新时代中国“两个结合”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

一、德国文化传统具有独特“内在性”特性

“内在性”传统在德国民族主义和思辨哲学中得以体现,它是影响德意志民族认同和社会发展路径的重要文化特质。在这种传统的塑造下,18至19世纪的德国在整个欧洲文化格局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化风貌。

(一)“内在性”传统影响下德意志民族特殊的认同建构

历史地看,邦国分立、长期缺乏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德意志民族曾面临的现实,这种局面从中世纪持续到18世纪末也未能有改观,主要原因在于:封建邦国体系下各邦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需要,竭

收稿日期:2025-06-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243300005)

作者简介:杨增崇(1982—),男,云南玉溪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研究。

①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实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力固守割据状态。同时,德国缺乏实现民族统一的有力领导力量,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无法真正改变传统封建格局。政治的高度碎片化严重影响德国人认同情感的安置,致使知识精英不断追问“什么是德国(式)的/什么是德意志的(Was istdeutsch)”这个在根本上关系到自我塑造和民族特性体认的研究课题。对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样态,马克思作出精准而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当时,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业发生了革命并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业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①进言之,彼时德国同法国和英国存在断层般的落差,面对法国和英国物质、精神层面的巨大成就及其现代性观念的冲击,一种全新而又迫切的民族认同方式于18世纪中后期爆发,德意志民族在文化领域开启“内在性”革命,“狂飙突进”民族文学运动、浪漫主义运动以及德意志古典哲学运动争相迸发,文化版本的民族主义在德国蓬勃兴起,知识界以哲学、文学等为文化载体不断追问民族特性、强调“德国性”,力求打破法国文化霸权,回应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文化层面的民族认同的形成不仅是由当时分裂割据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而且深受德国特有的“内在性”文化传统影响。

“内在性”最早可以追溯至奥古斯丁。查尔斯·泰勒认为,奥古斯丁是开启内在性转向的奠基者,他呼吁人们内在于自己,指出:“我们走向上帝的主要道路不是经由客体领域,而在我们自己‘之内’。这是因为上帝并非只是超验的客体,或只是更接近我们努力要认识的客体秩序的原则。”^②泰勒进而揭示了这种“内在性”的激进本质,认为“奥古斯丁引入了激进反省的内在性,并把它留给西方思想传统”^③。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主张“因信称义”,强调“信”的重要性和先在性,认为个体“自我”可以凭借“信”接受上帝恩典进而“称义”,这意味着路德的宗教改革将意识从外部规范和权威中解放出来,强调在自我确证的基础上建立真理,进一步孕育和发展了德国人“内在性”的文化意识,自此一种以思维内省和内在超越为核心特征的民族文化特性得以形成。而对于这种“内在性”及其影响,黑格尔从比较的视角进一步确证,指出:“为什么法兰西人从理论方面立刻进入实际方面,日耳曼人却满足于理论的抽象观念呢?”^④“日耳曼民族的内在性”^⑤便是答案。正是“内在性”文化传统为德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立足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时代错乱”的图景:当欧洲其他国家忙于资本原始积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时,德国于思想理论和文化领域分享现代性果实,通过向内求索的方式构建民族认同。

(二) 民族主义作为“内在性”文化传统的历史显现,构成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曾指出:“除去一些特例,人们可以将民族分为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与国家民族(Staatsnation)。前者主要基于某种共同的文化经历而凝聚起来;后者首先建立在一种普遍的政治历史与法则统一力量之上。”^⑥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德国毋庸置疑属于前者,因为强调共同语言、共同风俗、共同历史记忆的文化民族主义使得德国人的存在领先于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存在,这也是德国不同于英国和法国之所在。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⑦所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文化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应该是在现实形态的民族国家建立以及民族国家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确立之后,才开始出现。然而,落后的现实状况加之“内在性”文化传统的影响,德国未能依循“经济—政治—文化”的路径走上如同英国和法国般相对健全的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也未能孕育、发展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契合的、具有开放包容特征的民族文化。因而,德国式的文化民族主义虽然客观上于民族内部发挥了关键的价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1页。

②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③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版,第415页。

⑤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版,第388页。

⑥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值认同和民族凝聚作用,但是它将民族性作为文化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唯一标准,以民族性遮蔽时代性,以一种抽象整全性分解现实矛盾,导致现实中的民族困境难以被真正解决,反而在文化的孤芳自赏中进一步加剧。

值得关注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有政治转型的倾向。当时的外部入侵极大激发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因此知识分子不仅在文化领域强调德意志民族特性,也在政治层面呼吁对本民族重要性的承认。随着知识界关于民族国家理论探索的深入,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集权的政治统一是发展文化的先决条件。基于此,费希特将国家拔高为德意志民族道德和宗教的教育者角色。黑格尔提出国家的独立自主是“现实精神的自为的存在在这种独立性中达到了它的定在,所以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①。然而,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当意识先于存在就容易陷入理想主义的泥淖。政治实践的严重缺乏致使当时知识分子关于未来民族国家的理论设想过于不切实际,如费希特将民族国家的未来寄托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和语言传统,试图通过精神唤醒超越政治上的分裂。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②,作为理性共同体实现了普遍与特殊、理性与欲望、道德与自由的统一。总之,德国政治分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迟缓,缺乏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支撑其文化内核的历史现状,导致这一时期德国的民族主义尽管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高度发展,但始终未能实现有实质内容的政治转型。

(三) 纯粹思辨路向的德国哲学作为“内在性”文化传统的深刻体现,构成民族主义存在的重要方式

在近代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中,纯思辨路向的德国哲学为民族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存在方式,两者的关系并非直接的理论主张上的承启,而是通过哲学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形塑,以及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反思而体现出来的。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③意思是一个民族只有构建起自己的哲学,才能找寻到其自身存在、文化存在的根据。而当时德国同充分发展的现代世界存在距离,“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④。所以德国哲学家完成了本应由政治家背负的时代使命,其以观念把握现实的方式,通过对理性、自由和历史等的思辨分析展现对人类整体发展的关怀。然而,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表达并未纯粹呈现为世界主义的主张,而是在深层次上展露出对德国独特命运的追问和关切。费希特曾以乐观主义的立场“歌颂光荣的法国人民”,但是耶拿战争的爆发使他改变了原初的积极态度,甚至花费大量笔墨凸显德意志民族的独特优点。他曾在《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日耳曼民族的主要差别》章节中指出:“德意志人说的是一种最初由天然力量迸发出来的时候起就一直活生生的语言,其余日耳曼部族说的则是一种只在表面有活力,在根部却僵死的语言。”^⑤这种“活生生的语言”产生的效果之一是“德意志人合乎自然,外国人随意和矫揉造作,这是双方根本的不同点”^⑥。费希特意在强调德语的纯洁性,以及德国的民族精神是其作为最有理性的民族的根本保障,希望以此引领德意志民族走向复兴。黑格尔以逻辑统摄历史的原则展开一幅世界历史图谱,强调引领世界历史方向的日耳曼精神是“绝对精神”的完成,也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完成。他直言:“日耳曼民族纯粹的内在性,乃是‘精神’解放适当的场合。”^⑦这种哲学思辨通过对德意志民族语言、历史和精神的反思,为德意志民族主义支撑起一种内在的深度和广度,满足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在“期待”的情感张力中表达理想诉求的需要。可以说德国思辨哲学具有显著“内在性”特征,其作为思想的思想沉溺于抽象思辨与纯粹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384 页。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288 页。

③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2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 页。

⑤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68 页。

⑥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79 页。

⑦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94 页。

的逻辑,“先从事实得出一个抽象概念,然后宣称这个事实是以这个抽象概念为基础的。这是给自己装上一副德国人的深思的和思辨的姿态的一种最便宜的方法”^①。对于概念的逻辑推演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展现其精神高度的主要方式,这使得以思辨哲学为依托的民族主义渗透到德国社会各领域,呈现出同其他国家民族主义思潮不同的思想面貌。

二、马克思对德国“内在性”文化传统的批判性思考

德国的民族主义和思辨哲学是其“内在性”文化传统的深刻体现,这种强调精神内省的传统,一方面赋予了德意志民族之于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塑造了他们在思想深度与哲学思辨上的独特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传统容易使得知识分子将政治问题置换成思想文化议题,沉溺于纯粹思想领域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展开了对德国思辨哲学和民族主义的批判。

(一)以现实路向终止“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

思辨的德国哲学构筑起民族主义在“内在性”领域培植民族优越性的形而上学支撑,青年马克思以对思辨哲学的科学批判确立起对“内在性”传统扬弃与超越的逻辑起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序言中,马克思开宗明义:“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萎靡的德国民众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②虽然马克思所要揭穿的对象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但是其作为思辨哲学的典型形态,这一批判性表述在逻辑上彰显着马克思对于德国思辨哲学的整体把握。“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凸显了思辨哲学的特质,即主张观念统治世界,相信对“虚假观念”的哲学批判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完成,这其实就是“内在性”传统在思辨哲学家那里的思想表现。不可否认,深受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马克思曾受到思辨哲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体现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体性的“自我意识”概念就是典型反映,从这个视角可以说,德国“内在性”文化传统间接在马克思身上留下过痕迹。但是他并未驻足于这一思想阶段,而是从以“自我意识”为内核的理性主义信仰者转变为新哲学的开拓者,这一转变的实现表现为对思辨哲学“内在性”困境的扬弃和超越。

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在一般意义上批判思辨哲学,表达对“真正的哲学”的理解,指出德国哲学“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③。而真正的哲学势必脱离抽象的思辨外壳,敏锐捕捉时代问题,“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④。马克思的批判并非随机偶发的感想,而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向“哲学”提出要求,“哲学”必须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才能真正回应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以一种“内在性”的方式遮蔽问题本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⑤这里“消灭哲学”的对象仍是保守的思辨哲学,此论述是马克思针对德国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歪曲哲学同现实世界(黑格尔法哲学与德国的政治现实)关系所作的归谬性论断,原因在于两个派别将哲学同现实对立,殊不知哲学其实是现实生活的观念补充,而现实生活是哲学在实践中的展开。马克思并不是决心消灭一切哲学,而是要让哲学变成现实性存在,用变革现实的实际行动代替纯粹思辨的理论抽象,从而超越“内在性”传统所造成的思维桎梏。他进一步指出,“批判的武器”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⑥。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转变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他借助社会主义批判来展开对思辨哲学的批判,虽然此时他还未能使哲学变成现实,但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深入,马克思逐步意识到只有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才能实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传统哲学框架的根本性超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和劳动本质的扭曲,进一步孕育了自己的新世界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宣称,必须建构起能为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思想指引的科学的哲学。而关于科学的哲学的方法论原则——“纯粹经验的方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①;“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②。也即是说,实在的事物包括哲学家所研究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经验的事实,而经验必须同“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必要前提紧密关联。这种方法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性序列出发,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正确把握世界的本真面貌,而且对于这种方法的阐释必然会导致对现存世界的“实践性”的理解。这就与思辨哲学家在“内在性”传统影响下,注重以观念逻辑把握现实的方法有了根本的不同。同时,“实践”是马克思新哲学中的关键范畴,在他的视域中只有人开始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时,人作为现实的主体才走上确证自我的道路,这同“内在性”传统强调通过思维内省实现自我确证存在根本区别。所以,只有马克思的新哲学才能对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指导。

在本文的问题域中,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釜底抽薪的效力。首先,青年马克思的批判瓦解了历史叙事、文化叙事的形而上学基础。在马克思之前,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家受“内在性”文化传统影响,将人类历史视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认为德意志民族是绝对精神的化身,德意志国家是“全世界历史的完成和目的”^③。这种叙事方式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充分的哲学支撑,使其将德国文化特殊性上升为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形而上学真理。马克思在新哲学的形成过程中,揭示出当时德国哲学、文化的繁荣仅仅是现代性发育不良的症候,间接解构了“内在性”文化传统的合法性基础。其次,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批判为文化的来源、本质找到了真正科学的解释路径,消解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基础。他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④这就拨开了“内在性”传统影响下民族主义的唯心主义迷雾,即被民族主义者视为民族特性的精神生产质料不过是实践的产物,正是“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创造了人本身以及人的各种共同体生活,祛除了文化的神圣化地位。最后,从在一般意义上批判德国思辨哲学,到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推进工作,到聚焦提出新哲学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对思辨哲学形而上学逻辑的抽丝剥茧,间接昭示着在德国“内在性”传统之下,德国知识界囿于思维内部的“应然”预设,实质是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包袱”。而马克思新哲学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指出:“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⑤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以全人类的解放方案根本取代民族主义和思辨哲学的文化使命,使得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从目的降格为手段。而同时,全人类的解放一定不是在“内在性”领域生成的乌托邦,它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和社会制度革新,是一幅生动的未来图景。

(二)“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揭露民族主义传统的狭隘性

有观点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主要涉及“批判消极的民族主义、肯定积极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和兼顾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三种民族主义思想^⑥。而本文所指涉的民族主义在马克思的语境中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页。

⑥吕秀彬:《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民族主义思想的“三大争论”及评析》,《世界民族》2021年第4期。

表达为“傲慢的和无限的”^①民族主义,包括在“消极的民族主义”范围之内。马克思对德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的主旨态度是批判的,集中表现为他对青年黑格尔派所强调的民族精神的批判。

鲍威尔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在著作中将犹太人问题归结为纯粹的宗教问题,认为犹太人之犹太教的排他性和守旧性使其不愿平等对待有其他信仰的信徒,而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女儿”,排斥和压迫犹太人也是合乎基督徒和基督教国家的本质的做法,因此宗教解放就是政治解放,一切宗教的废除是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获得同基督徒相同权利的先决条件。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②。因为在已经完成政治解放的北美,在生活中依然有宗教的困扰问题。这意味着政治国家的解放不是人的解放,而“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③。即犹太人的根本解放在于世俗生活基础上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通过马克思和鲍威尔的论战,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其一,马克思不限于犹太民族问题本身,而是转变思想轨道,从关注“安息日的犹太人”转向关注“日常的犹太人”,在社会关系的视野中理解犹太人问题,继而提出人的解放。其二,鲍威尔在处理犹太人问题时有意将德意志民族摆放于其他民族之上,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在宗教层面论证基督教优于犹太教,而当时的德国是典型的基督教国家。鲍威尔主观优化自身民族地位的立场有着典型的“德国中心论”色彩。在针对《犹太人问题》所引发的争论而进行回应的文章中,鲍威尔指出:“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具有某种优点。假如有一个民族能成功地……获得对其他各民族的精神优势,那么这个民族必定是能够批判自己和其他各民族并能认识普遍衰败原因的民族。”^④其中,所谓的“批判自己和其他各民族”的民族即德意志民族。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给予了回击,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优越的地方,而能够“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以及“能认识普遍衰败的原因”不能构成评判民族优劣的标准,鲍威尔的关切并非是克服民族局限性或消除民族偏见,而是凸显本民族的优越性,他“正是通过这种漫画化的、基督教日耳曼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⑤。鲍威尔及其所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实质是傲慢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其在深层次上所张扬的个体性原则排挤其他民族,这种民族主义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对其批判的完成主要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中,马克思指出:“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狭隘性、地域局限性……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⑥其中,“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表明,要检视和评判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发展的逻辑悖论及其历史命运,就必须以一种外部客观立场来反观这种具有“狭隘性、地域局限性”的哲学。马克思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他对比分析英法、德的哲学,指出:“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⑦马克思以一种“他者”视角审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揭穿其在“内在性”传统影响下,将思辨理性视为德国民族性,在此基础上的哲学思想并不具备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而至多只具备对德国本身的地域性意义。“这些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以为他们无限地超越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酒店庸人带来更多的民族偏见。”^⑧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揭露德国“先知”们抽象掉现实规定性,以一种德国哲学的方式嫁接英法共产主义文献和思想,“他们在一切领域都把自己的幻想看成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活动所下的最后判决……断言整个历史过程在德国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⑨。“真正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35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5页。

的社会主义”立足德国哲学来讨论现实问题,其实质还是民族狭隘性和局限性的表现,势必阻碍德意志民族的发展。总之,马克思的批判不单是对 19 世纪德国思想界的理论回应,更是对德国民族主义所固守的狭隘的民族世界观的揭露,正是在这一世界观的影响下德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性和保守性,并在当时与政治保守主义合流为抵制现代性变革的力量。同时,这种局限于“内在性”领域建构民族优越感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缺乏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关怀,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新哲学的产生表现为一种对“内在性”传统的超越。

三、马克思对待德国“内在性”文化传统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①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他在对待自身文化传统过程中所展现的科学态度,对当今中国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性意义。新时代中国“两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原理性成果,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精髓,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

(一) 把握批判性思维与继承传统的辩证关系

从马克思对德国思辨哲学和民族主义的批判可以发现,他早已意识到“内在性”的文化传统是德国发展的双刃剑。一方面,关注内在的自省为德国发展出一种广阔的精神活力和思维创造力,使得“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②。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向内”的文化取向容易导致过分强调民族精神的独特性,将思想沉浸在自我完满的逻辑中,从而误将德国的特殊性视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滋生出民族中心主义立场。正是在此背景下,“现实的、地方的省区的狭隘性”与“世界主义的自夸”^③表面矛盾实则文化心理一致的现象同时存在于德国社会。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这种“内在性”传统表现形式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全盘否定这一传统,他的批判中持有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以及要实现扬弃和超越的决心。当“内在性”传统映射于民族主义者,其所展现的对自身民族文化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受这种传统浸润的德国哲学家把人类思辨的精神力量推向纵深而产生的理论成果,都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他对德国哲学家所擅长的“头脑”的原则的重视。只不过在马克思这里,只有其所构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哲学才能真正发挥武装头脑的建设性功能。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在传统中反传统”的辩证张力。

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有过一个对自身文化传统反应激烈的时代,即 19 世纪下半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两股泾渭分明的文化思潮相互对峙,但其实质都是由民族危机所引发的主体内在意识的觉醒。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这两种思潮的出现同 19 世纪上半叶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着相似的时代处境。但不同的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守正创新之鲜明品格,“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并在“守正”的基础上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才促使文化思潮所承载的时代使命、时代问题得以落地和解决,中国不仅成功走出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双重困境,而且在具体实践中推进理论和实践双重创新,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以文化主体性为根本依托,鲜明反照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展现出的“文化自大”心理倾向,是对近代国人文化自卑心理终结的现代回响。所以,习近平一语中的地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④。在这个过程中,如马克思所指明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中国共产党继承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6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12 页。

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0—471 页。

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批判性的本质属性和批判性精神,辩证地对待中华文化传统,对其中所存在的糟粕进行剔除,进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庞杂的文化传统中萃取。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正式提出,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觉,更表明其对文化场域中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他者与自我三重关系认识的深化,因此,只有“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才能真正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二)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创新

通过马克思对德国“内在性”传统的扬弃和超越可以洞悉,他当时面临棘手的时代困境:其一,德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发达,同落后的德国现实出现“错位”;其二,民族主义话语往往强调德意志民族特殊性和精神使命,以此掩盖新兴资产阶级在推动社会变革上的软弱与无力;其三,德国思辨哲学脱离现实社会基础,主张以观念逻辑弥合现实矛盾。这些问题归结而言都是理论与现实严重割裂、现代化的普遍性与德意志自身特殊性碰撞所产生的后果的不同表现,他们共同塑造了马克思提出“消灭哲学”、创立新哲学的思想文化场域。“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①正是围绕这一核心关切,马克思从一般意义上到结合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批判德国思辨哲学,从单纯的“犹太人问题”到“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为了完成哲学变革,建立起能够真正指导实践、具有生命力的哲学。这一过程充分表明,马克思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是对现实“问题”的正确提炼,这是他能够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准确把握矛盾的关键。

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两个结合”彰显鲜明的问题导向。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在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得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结论。这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管用”,而且展现出只有在正确处理两个文化主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科学的理论叠加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决定了“第一个结合”的必须出场。其次,“第二个结合”立足于“两个大局”以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面对如何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发芽、如何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背景所明确提出,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思维视域拓展丰富的结果”^③,同“第一个结合”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已然有新变化。而一个来自西方工业社会的文明成果能够同一个来自东方国家,并且是从其封建社会时代中衍生的文明成果相“结合”,除了彼此价值倾向和思维方式相互“契合”之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问题意识,能够根据时代和时势的变化及时回答时代之问,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结合”的结果再一次证明,来自19世纪的文明不一定是落后文明,来自工业社会的文明不一定只能是外来文明,来自封建社会的文化成果不一定只是落后腐朽思想的集合。因此新时代要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持续推进“两个结合”。

(三) 树立世界眼光与超越民族局限性的大文明格局

前文已经指出,不论是德国的思辨哲学还是民族主义,深层次上都折射出一种“德国中心论”色彩或“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文化偏见。马克思对德国哲学和民族主义的批判不仅是对特定思想体系和社会思潮的反思,更展现出一种大文明视野。在批判德国思辨哲学时,他反对空谈抽象理念而忽视社会现实,突破了德国的“内在性”传统;在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时,他揭示出其背后所表彰出来的民族偏见,“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④。这种大文明视野不仅促使马克思以辩证的态度审视德国“内在性”传统,还使得他不拘泥于特定民族,善于从英法等国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构建自己的新哲学,其主旨在于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马克思的思想超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③杨增崇,尚晋:《目前学界关于“第二个结合”研究:回溯与评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4页。

越了单一民族的局限,体现开放包容、面向世界的大文明格局。

“文化从本质上看,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①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不可能形成发展于孤岛。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分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普遍化,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间、民族间的历史性互动愈益频繁。而正是在中国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在近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碰撞中,马克思主义得以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有世界眼光的政党,从形形色色的近现代西方思潮中坚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了“第一个结合”到新时代的“第二个结合”,不仅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具有世界性特质和科学文化精神的真理,而且表明一个民族只有以超越民族局限性的思想格局拥抱真理,才能真正发挥它改造世界的思想伟力。需要区别的是,这种超越民族局限性的视野强调的是对其他民族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以及在交流互鉴基础上实现文明的平等对话,其本质区别于西方的“文明扩张”理念。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②这一论述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世界大党的大境界、大格局和大胸怀。新时代中国“两个结合”,始终在观察世界、把握世界、回答“世界之问”,唯有如此,才能占据人类文明发展制高点,为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和人类美好未来提供鲜明的文明导向。

Young Marx's Attitude Towards the German "Immanenc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It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YANG Zengdong & DANG Jiame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how to approach one’s own cultural tradition” constitutes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German “Immanence” cultural tradition serves as the premise for young Marx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tradition, which emphasizes introspection, makes the German people respond to the identity crisis arising from the “absence” of a unified nation-state through cultural nationalism, while speculative philosophy serves as the “cultural medium” sustaining this nationalism. While the “Immanence” tradition cultivates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distinctive philosophical depth of the German people, it also predisposes intellectuals to displace political and social questions onto the domain of abstract thought, thereby estranging them from concrete realities. The young Marx transcends this tradition by critiquing speculative philosophy’s substitution of abstract reasoning for practical transformative action, and exposing the parochial worldview of German nationalism.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demonstrated by Marx in critiquing the German “Immanence” cultural tradition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Two Integrations”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Key words: Marx; the German cultural tradition; “Immanence”; the “Two Integrations”

(责任校对 张伟平)

①邹广文:《“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方法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